

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

刻经研究

邓星亮 著

SICHUAN ANYUE WOFOYUAN SHIKU KEJING YANJIU



本书获山西大同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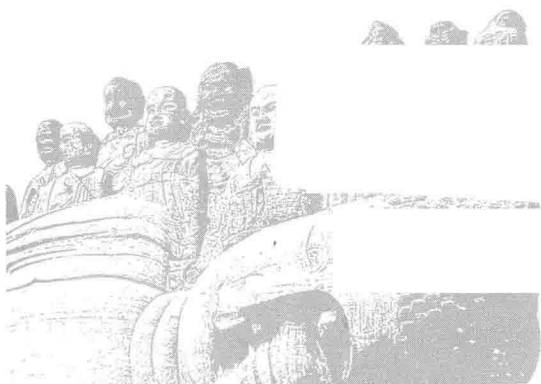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西南佛教文献研究』（编号：12JJD750022）成果

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

刻经研究

邓星亮 著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刻经研究/邓星亮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5. 6
ISBN 978-7-5531-0543-7

I. ①四… II. ①邓… III. ①石窟—宗教石刻—介绍
—安岳县—唐代 IV. ①K546.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9214 号

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刻经研究

邓星亮 著

责任编辑 童际鹏
出 版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 bsbook. 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8mm×210mm
印 张 11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31-0543-7
定 价 30. 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一、序说	1
二、课题之意义	3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5
四、本课题研究不足之处	10
五、本课题拟创新之处	12
六、基本思路和内容设想	14
七、研究方法	15
第一章 石窟刻经的相关概念	16
第一节 关于石刻文字的几个概念	16
一、金石学的定义和范围	17
二、刻石与碑	19
三、石刻学及其成为专门学科的必要性	21
第二节 石刻文字的分类	22
一、刻石分类综述	23
二、刻石分类刍议及其重要种类“石窟刻经”	26
第三节 中国佛教刻石	30
一、中国佛教刻石的历史	31
二、中国佛教刻石的种类	33

三、佛教石窟刻经	42
第二章 卧佛院石窟刻经概述	49
第一节 安岳卧佛院	49
一、地理、自然状况	49
二、历史沿革	53
三、人文风情	56
第二节 卧佛院石窟刻经	69
一、石窟刻经的分布	70
二、石窟刻经解题	82
第三节 卧佛院石窟刻经的类型比较	101
一、石窟刻经的特征分析	101
二、刻经类型的建立和分析	110
第四节 卧佛院石窟刻经和摩崖造像的关系	118
一、涅槃变像和《大般涅槃经》	119
二、其他造像和刻经间的关系	128
第五节 刻经与造像的现状调查	130
第三章 卧佛院石窟刻经版本	140
第一节 《佛说佛名经》	141
一、《佛名经》概况	141
二、卧佛院石窟本《佛说佛名经》	143
第二节 《佛说报父母恩重经》	146
一、《佛说报父母恩重经》概述	146
二、《报父母恩重经》录文	149
三、卧佛院《报父母恩重经》的特点	152
第三节 《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	161
一、存世诸本的情况	161
二、卧本《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	164

三、诸本之间的比较	166
第四节 其他佛经	170
一、《佛说灌顶经》	171
二、《合部金光明经》和《佛说禅法略出》	173
第四章 佚经《佛说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考	178
第一节 录文	179
第二节 结构与内容	183
第三节 真伪辨析	185
一、佛典来源	188
二、佛理变迁	208
第四节 创作背景	210
一、经文出处	210
二、经文的创作年代	249
第五节 流传与影响	255
一、流传的时代跨度	255
二、流传的地域跨度	258
三、流传时产生的影响	259
第六节 余论	268
第五章 卧佛院石窟刻经的俗字	270
第一节 俗字的定义	271
第二节 卧佛院石窟刻经俗字的使用特征	274
第三节 卧佛院石窟刻经俗字的类型	279
一、混用型	279
二、误用型	281
三、增形型	284
四、省形型	286
五、改换型	289

4 四川安岳卧佛院石窟刻经研究

六、类化型	291
七、位移型	292
八、书法变化型	294
九、整体改易型	295
十、笔画异写型	296
第四节 卧佛院经文与敦煌文书的俗字比较	296
结 语	305
附录一	309
附录二	325
后 记	346

前言

一、序说

盖一思想之成熟，必有相关经典之结果，放之古今中外，少有例外。经典之流传，或假口耳，或形图画，或资文字，不一而足。其形诸文字者，视书写材料之差异，竹皮树叶、兽皮锦帛、龟骨金器等，每每可见。尤为熟识者，素纸朴石也。

镌文句于石上，名曰刻石。其于我国之存在，历史悠久，灿若星河。上古者如秦襄公之《石鼓文》，中古则儒家开石经之先河，继有东来之释家壮其声势。儒典则东汉熹平四年之熹平石经，元魏正始间之正始石经，继之者则李唐开成二年之开成石经、后蜀孟昶之蜀石经、北宋嘉祐六年之北宋石经、南宋高宗御书之南宋石经、清乾隆之清石经等^①；佛典之代表，则以房山石经^②、灌县之青神山石

① 参见贾贵荣辑：《历代石经研究资料辑刊》（全八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② 参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经^①、响堂山石窟刻经^②、安岳卧佛院石窟刻经^③为冠。其所以为冠者，部类众多，包罗丰富，非他刻之单调可比拟也。至若一经一偈，一颂一名，则举不胜举，数不胜数。

佛教有关刻石之最早者，当是印度阿育王之石刻法敕^④，乃为推广佛法而颁布之系列法敕，刻诸摩崖，或石柱，或石窟之上。洎白马东来，汉土之佛风日益炽盛，佛经之译写欣欣向荣。此种氛围之下，加以儒家开刻石经之熏染，遂有好事者凿刻佛教文句于石上，所谓汉土佛教刻石之始也。

汉土佛教绵延千数年间，观其刻石，要其内容，约略可分为四类，其一为佛名，现存佛名刻石多见于山东，如山东书院东山佛名“大空王佛”，大寨山佛名“阿弥陀佛”，凤凰山佛名“弥勒佛”、“华光佛”、“佛”，陶山“观世音佛”，东平洪顶山“药师琉璃光佛主”、“大山岩佛”、“式佛/维卫佛/式佛/口弃佛/口口佛/口口含牟尼佛/迦业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弥陀佛/观世音佛/大势至佛/释迦牟尼佛/具足千万光相佛/安乐佛/”^⑤等；其二为佛经名，山东银山佛经名“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是也；其三为发愿文或题记，多附于刻像造塔之末，其例甚多，兹不详举；其四为最常见之佛经，上举房山石经为典型。

推而论之，佛经刻石以所刻石材样式又可略分为六，其一曰摩崖，泰山石经峪之金刚经是也^⑥；其二曰经塔，世所谓北凉石塔者，

① 参见胡文和：《灌县灵岩山唐代石经》，载《四川文物》1984年第2期。

② 参见李裕群：《郾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载《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③ 参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刻经窟》，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天地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

④ 参见元亨寺本《南传大藏经》之“阿育王刻文”，高雄：元亨寺妙林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⑤ 参见赖非：《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⑥ 参见《泰山金刚经》，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1984年8月第2次印刷。

多刻《佛说十二因缘经》^①；其三曰经碑，早期经碑多为造像刻经之合体，如曲阜胜果寺所见之经碑，碑阳造释迦像，碑阴刻金刚经。稍后则有单独刻经之经碑，如山东海檀寺之《观世音经》碑^②。至若房山石经，琢石为碑，广刻佛经，实经碑之大成，非他碑所能方轨齐驾也^③；其四曰石柱，风峪华严经是也，刻华严经于约160通之方石柱上^④；其五曰经窟，安岳石经是也；其六为经幢，以唐时称盛，多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⑤。

前所列之佛经刻石诸样式，论其始创，则溯自元魏；寻其原委，则观颂供养，以备法灭，不一而足；考其经文，自四大部以逮金刚、尊胜常刻之外，他经时或见闻，真可谓珠林之渊鉴，法藏之碎金。然则佛经刻石之中，总以经碑与经窟见长。盖其工程宏大，浸染长久，构思缜密，经目众多，摩崖、经塔、石柱、经幢方之篋如也，观而后叹像教之愿力甚深。其石窟刻经之翹楚者，则又非安岳石经莫属。

二、课题之意义

安岳石窟刻经者，世所鲜知也。按诸历代金石之撰述，未尝或闻；方志之纂辑，片言未及；佛典之法宝，只语不见。近世东西方探险队之流，辗转中国，穷尽搜罗，抑亦未闻也。甚者如十八世纪初入中国之法国伽尔列考古队，其专务考察四川一省之古物，旨在

① 参见殷光明：《北凉石塔分期试论》，载《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

② 赖非：《山东北朝佛教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前引书，第155-160页。

③ 参见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前引书。

④ 参见（清）王昶：《金石萃编》，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2版，第576页。

⑤ （清）叶昌炽撰，韩锐校注：《语石校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10页。

深广，迹遍川渝，未闻安岳也^①。今学界之始闻安岳石窟者，赖张圣奘、吴觉非二公之介绍，然于卧佛院之像龕经窟，二公或失之交臂，不闻载述^②。公元一九八二年三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曹丹先生获悉，安岳城北约四十公里之三县交界处或有石窟遗迹，于是前往考察，并于其后赖四川省文化厅之支持，主持制作卧佛院刻经之拓片。千年之宝物，遽得示真颜于天下^③。四方之学人，遂幸阅古迹而成文，一时之研究蔚然而起矣。

安岳卧佛院石窟刻经之研究意义，概而言之，约略如下：

1. 一时代新材料之发现，于学术研究而言，诚有开创绍隆之功。是则孔子壁坏，经学昌明；藏经洞开，敦煌鹊起。论之安岳刻经，诚不能谬夸其可启一代学术之风，然则其刻经之发现，于中国佛教传播，经典流传之研究，可堪襄赞也。对于卧佛院现存实物而言，刻经、造像、题记并存，琳琅满目，则学人欲以唐代之蜀地佛教阐微发幽者，不借不足以探其深，不据不足以明其远。其于蜀地佛教发展之历史动态研究，功莫大焉。

2. 卧佛院之石窟刻经，以今世所发现之佛教刻石较之，规模内容虽不及房山石经之庞大丰富，然其刻经与造像共存之特质，非房山之可比。以现存刻经造像共存之佛教石窟遗迹而言，开凿年代不及响堂山、娲皇宫石窟久远，然卧佛院之刻经类目繁多，内容丰富，则响堂山、娲皇宫、金川湾石窟又不能望其项背。比列上述石窟和卧佛院石窟刻经，则汉土佛教刻经之梗概已具，堂室可登，一部石窟刻经史蔚然大观也。

3. 卧佛院之刻经，究其经目有十八种之众，数其文字有二十七

① 参见〔法〕色伽兰著，冯承钧译：《中国西部考古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9月第1版。

② 参见张圣奘：《大足安岳的石窟艺术》，载《西南文艺》，1952年第19期；吴觉非：《四川安岳县的石刻》，载《文物参考数据》，1956年第5期。

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刻经窟》，前引书，第8页。

万之多，考其年代上溯有唐开元之年，勘其布局多呈经像井然之列，林林总总，气象不凡。比对各经之版本，则经本之渊源流传，朗然可鉴；校讎诸经之文字，则佛典之鲁鱼亥豕，了然可明；考证经像之年代，则川渝石窟造像刻经之传承影响，信而有征；推定经像之布局，则卧佛院龛窟始建造者之宗派山门、凿刻目的，有迹可循。

4. 古人叹典籍存远之艰厄，每谓缣緙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永，皮纸易灭，更兼杀青有缺，韦编有绝，遂刻诸崖石，一托永贞，永垂昭晰，冀书未仙游，字无飞灭。卧佛院保存之佛经中，即有赖此而传之佛教佚经数部，端乃法教之遗珠，弥足珍贵。其《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佛说禅法略出》者，其十余条造像刻经之题记者，又今世误称“檀三藏经”之经名者，无不为中古社会之思想写照，信仰之映射，中国思想史、社会史研究之借鉴者不容小觑，其为佛教疑伪经研究之宝贵也。

5. 卧佛院之刻经，二十余万字之巨制，其经文之书体或楷书，或魏隶，字势或空灵，或古朴，艺术表现方式多样，乃研究中国书法艺术之不可多得之资料宝库。加之经文书写非一人为之，勒石非一人作之，则其于蜀地刻石匠人之考证，诚谓珍贵之史料。进而言之，非有卧佛院刻工之研究，则中国刻工史为不完整之历史。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安岳卧佛院之石窟遗迹，一旦显峥嵘于天下，四海学人往来不绝于道，赞誉交加，文章迭出。然其论著撰述多于卧佛院石刻造像之各方面研究，专注于石窟刻经者凤毛麟角，未能形成与刻经自身价值与地位相当之研究成果，殊为学界憾事。究其原因，窃以为石窟刻经原始材料之不易获得，实研究者难逾之藩篱。加之卧佛院地处偏僻，地方介绍不力致四方学人不闻，鲜有研究重视关注之。今

搜罗遍求诸君之文，就安岳石窟刻经研究现状评述如下：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外撰述未有提及安岳石窟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有国内学者触及安岳石窟，如最初介绍安岳石窟者张圣奘之《大足安岳的石窟艺术》（载《西南文艺》，1952年第19期），稍后则吴觉非之《四川安岳县的石刻》（载《文物参考数据》，1956年第5期），其文仅涉及安岳名声早传之千佛寨、华严洞、圆觉洞、毗卢洞等处石刻造像介绍，于时卧佛院石窟仍默默无闻。以历史眼光视之，则张吴二公开安岳石窟研究之风气，启后学者之懵蒙也。

十年浩劫，文运衰竭，非但一应佛学荒芜殆尽，且众多文物遽罹人祸，安岳石窟之至僻者卧佛院亦不能幸免。及至八十年代初，方闻安岳卧佛院，乃有相关之研究问世，刻经之专门研究方得接踵而出矣。究其研究角度、深度而言，可大略划分如下：

其一，多以安岳整体石窟为把握对象，于考察石窟造像缘起、历史状况、形制、年代、艺术特色等诸方面时，间或提及安岳刻经概况，此类论著于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中颇多，多示以原始造像或部分刻经拓片之插图材料。

其专著之代表者如彭家胜等《内江地区文物简志》（1983年12月）；唐承义著《安岳石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四川省文物志试刊本》（第一辑，1985年11月）、《安岳石刻雕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汪毅著《中国佛教与安岳石刻艺术》（中国旅游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刘长久著《安岳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中国西南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崔刚、汪学林著《安岳石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论文之代表者如刘长久、胡文和之《四川石窟造像艺术概论》（载《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6期）；负志安《安岳石窟寺调查

记要》(载《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丁明夷《四川石窟杂识》(载《文物》1988年第8期);王家佑《安岳石窟造像》(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傅成金《安岳石刻造像的数量与始造年代》(载《四川文物》1991年第2期);傅成金、唐成义《四川安岳石刻普查简报》(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唐成义《安岳石刻艺术》(载《大足石刻研究文集》,1995年3月);曾德仁《四川安岳石窟的年代与分期》(载《大足石刻研究文集》,2002年8月第3期);金助琪《漫话安岳石刻》(载《文史杂志》2003年第3期);石永恩《简说安岳石刻的价值与地位》(载《文史杂志》2005年第1期);萧易、袁蓉荪《虽默默无闻,但却光彩照人一寻访安岳石刻》(载《中国国家地理》第589期,2009年11月);金申《四川安岳涅槃佛像的解读及重修时代》(载《四川文物》2006年第5期)。

其二,以安岳卧佛院石窟群为考察对象,于安岳卧佛院龕窟之形制与内容实录、造像之题材、造像之年代诸方面多着笔墨,详述卧佛院十五窟刻经之内容。此类成果多为单篇论文,鲜有专著行世。

代表者如彭家胜《四川安岳卧佛院调查》(载《文物》1988年第8期),其文于刻经之概况、刻经之题记多有记述,尤为详细者乃逐窟述列刻经规模、经文位置、经文名称、卷品及保存现状,并于卧佛院龕窟创凿缘起、主持人、历代沿革等作初步探考,同文附插诸多经文拓片图。

其他论著,复有西人 Angela Falco Howard 之 *Tang Buddhist Sculpture of Sichuan: Unknown And Forgotten* 文中章节“Central Sichuan Anyue County: The Nirvāṇa Gully at Bamiaoxiang”(载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第60期,1988年),探讨部分刻经题记,并对唐代开元刻经之流行类别、刻经与造像之关系等问题给予必要关注。

胡文和《四川安岳卧佛沟唐代石刻造像和佛经》(载《文博》

1992年第2期),于部分刻经《灌顶经》《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给予版本比对与文字校勘,认为佛性海藏经为国内现存之孤本,卧佛沟刊刻佛经为当时民间之流行经本,实刻二十二种佛经。

邓之金《安岳卧佛院摩崖造像上限年代探讨》(载《四川文物》1993年第2期),认为卧佛院石刻上限年代为初唐贞观至永徽年间;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之“安岳县的造像龕窟”一节,除逐窟述列所刻佛经外,复于部分刻经之版本比对着墨甚多,更于73号窟题记“檀三藏经开元十五年二月镌了”之“檀三藏经”问题做深入考证。

李良、邓之金《安岳卧佛院窟群总目》(载《四川文物》1997年第4期),以卧佛院龕窟地理位置北岩、南岩和月亮坪之分布,逐窟逐龕述列龕窟内容、凿刻规模和保护现状,指出安岳石窟之传承系北承敦煌千佛洞、大同云冈、山东、洛阳龙门等地,并同时指明其余绪绵延至四川广元,波及绵阳、成都、遂州、普州、茂汶、巴州等处。

其三,专门以卧佛院刻经本身为对象,于石窟刻经之概述、版本渊源、价值、组织、整理、历史诸多方面加以研究,使得卧佛院石窟群的研究方向发生重大变化,即从最初的单纯考古性介绍,转向对卧佛院石窟刻经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和探索。对于进行这种开拓性研究的文章,分别介绍如下:

胡文和、李官智《安岳卧佛沟唐代石经》(载《四川文物》1986年第2期),述列刻经内容,考述《佛说报父母恩重经》之流传渊源,辨识“檀三藏经”之由来,明析刻经之部属分类,认为卧佛沟刊刻以涅槃部为主,多为辅助此处之巨制佛像涅槃变。

曹丹《安岳卧佛院卧佛刻经与题记》(载《四川文物》1990年第2期),述列刻经内容,探明刻经达十六部,对比卧佛院十二处刻

经造像题记，得出卧佛院刻经造像系由当地出家在家信徒为供养而凿刻之结论。

傅成金《安岳石刻之玄应考》（载《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以卧佛院及安岳其他石窟处题刻人玄应之遗迹，考证玄应之传略，认为卧佛院刻经与玄应有关。

四川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2008届硕士研究生龙臻伟学位论文《四川安岳卧佛院摩崖刻经调查与研究》，分刻经洞窟调查概况、刻经版本研究、与中原地区刻经之比较、刻经之思想研究等四目，于龛窟概况与分类，造像与刻经之关系，龛窟年代之推断，刻经版本之比较，卧佛院刻经与北朝邺城刻经、唐朝洛阳刻经之比较，刻经与唐代宗教政策、灭法思想、孝道思想之关系，《修多罗般若波罗蜜经》之教义等进行相当分析和阐发，惜其浅尝辄止，未能深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曹丹、于春撰文之《四川安岳卧佛院唐代刻经窟》，于卧佛院刻经文献之整理流传功莫大焉。其文介绍刻经发现、保护之始末，提及刻经缘起之诸说，详列诸窟刻经之内容，首次比较安岳石窟刻经与房山云居寺石经、四川石经寺石经、灌县灵岩寺石经和北京乾隆石经之分别，定义安岳石窟刻经为“刻经窟”，认为安岳刻经窟系佛教徒基于信仰而出资刻经，为供养而凿刻佛经，非为有组织计划之佛教刻经。

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卧佛院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一批针对卧佛院某一刻经的研究论文，为我们研究卧佛院石窟刻经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郑阿财《〈父母恩重经〉传布的历史考察》（载《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3月第1版）中“安岳石刻”，对卧佛院《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的录文进行了整理，并判别该经属于乙种版本系统；孙修身《〈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版本研究》（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对该经保存现状及版本性质与价值进行了深入探索；日人新井慧宇对卧佛院《佛说报父母

恩重经》进行深入研究，其《「父母恩重经」の「报本」の复元テキスト》（载二松学舍大学《国际政经》2000年9月第6期）对卧佛院两种《佛说报父母恩重经》刻本进行科学的整理，恢复其原始面貌，并就此版本和它的一些古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父母恩重经」の「报本」の特徴》（载《二松学舍大学论集》2001年3月第44期）对卧佛院概况进行介绍，重点分析卧佛院“报本”《父母恩重经》的一些特征，同时对该版本的产生年代进行了断定；龙臻伟《四川安岳〈佛说报父母恩重经〉研究》（载《华章》2008年第3期），对该经的内容、版本和流布进行了讨论。

前列之诸学人撰述，虽谓蔚然大观，然皆出研究者之自身学科专业角度，或出于文物保护，或出于石窟考古，其专业之局限不可避免，则安岳卧佛院宝库所包涵之深厚价值，未免幽暗不明，不识庐山真面目。未来之方向趋势，宜多角度、跨学科之研究，方可尽显卧佛院之本色，诚如汪毅《初论安岳石刻研究的角度》（载《文史杂志》1992年第5期）所言，以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诸多角度立体全方位进行深入研究，此其所以待诸君学人之努力也。

四、本课题研究不足之处

佛教东传汉土，石窟建筑亦应弘教之需求传入中国，盖其可供礼拜、谛观佛菩萨相好或供僧众禅修之功也。佛经赖口耳、抄写、刻石之世代传承，其刻石资借经塔、经碑、摩崖、石柱、石窟、经幢等诸载体而行世。石窟之与刻石结合而形成专门经窟者，曾不知经几时几世也，个中必然蕴含丰富之佛教史、社会史及思想史意义。由是观之，则今世之卧佛院石窟刻经研究，实为冰山之一角，所待开拓挖掘者甚多，故略述本课题研究之不足。

1. 于卧佛院石窟刻经之研究论题而言，其成果缺乏专门性和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